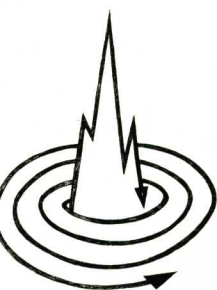


师生对丛书

师生对：

百姓日用而不知

左亚文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师生对丛书

师生对：

百姓日用而不知

左亚文 著
杨旭 绘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生对:百姓日用而不知/左亚文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1

师生对丛书

ISBN 978-7-307-19137-2

I. 师… II. 左… III. 哲学—研究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2147 号

责任编辑:詹 蜜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137-2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有感于哲学知识化和简单化的倾向，这些年来，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我一直在探索用研讨式的方法来启迪学生。我举办了“聊哲学”的沙龙，定期进行“句读经典”的讲座，在“哲学漫步”中随时开展“师生对”。其中第三种方式进展得最为持久和有效。从2015年年初起，我与一群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每天晚上在环绕珞珈山的漫步中开展“师生对”，对一些人们关心的哲学问题进行反思和重释。其方式是每晚讲一至两个问题，学生手持录音笔现场录音，然后由学生进行整理，再交给我作修改和润色。当然，这种方式是灵活的。平时，上课后，学生如有疑难，则随时可以对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在外面作报告，对于听众在对话环节所提问题，我也会以“师生对”形式作答。在这些听众中，有些是领导干部，也有一些是高校教师，有的甚至是知名教授。由于出版格式要求，这里一律以“学生”提问形式出现，请予理解。不过，这里的“学生”是一种泛指，有相当一部分问题则是我自问自答，因此，我也是其中提问的“学生”之一。

众所周知，由于哲学本身的独特品性，其最初就是以

“对话”和“论辩”的形式出现的。当年，苏格拉底行走于雅典的大街小巷，与人谈论哲学，所采用的就是对话式的论辩方式。他先佯装无知，以请教的方式向别人提出一些哲学问题，然后通过揭露对方答案中的矛盾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师承其志，在雅典近郊创办起了一所“阿加德米学院”（又称“柏拉图学院”），以探讨哲学和几何学闻名于世，其所研讨的方法也是辩证法。

在东方，几乎与古希腊同时，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众多思想家，亦在运用这种对话和论辩的方式探讨问题和学术。儒家元典《论语》的语录体裁实可以说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的生动写照。孟子的著述几乎都是论辩之作，其逻辑严谨，用词犀利，文风泼辣，至今读来仍扣人心弦，令人叹为观止。至于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更是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辩论之法，即采用“反论”的方式提出哲学问题，并且“日以其知与之辩”，而“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据说，惠施与人辩论时，常“倚树而吟”“槁梧而瞑”，此庄子所说的“惠子之据梧也”。可见，当时论辩之风甚炽，以致辩士们常在大树下公开争论，直至疲惫不堪，只好倚树而息、据梧而瞑。在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东方这些学者的争鸣之风与古希腊哲人的辩证之法虽天各一方，然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亦我之追寻也。余出身贫贱，然自幼好学。小学五年级时，即与哲学接触，从此与之结缘。当时，“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但有一位教小



学高年级语文的李系龄老师坚持给我们上课，带领我们学习“十六条”“老三篇”以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章，有时也给我们讲一些普及性的哲学知识。我对哲学尤感兴趣，觉得魅力无穷。当时，我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常年订有“两报一刊”及《解放军文艺》，时常也会收到一些讲解哲学的通俗读物。我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和两年小学，其当时的小学老师黎醒悟先生后来成为县中学语文教师，他多次到我家来，见我好学，就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有天赋，是个读书的种子。你要好好培养他。”然后，又对我说：“现在搞‘文革’，没有什么书可读了。但你能不放弃。你可以经常看‘两报一刊’的文章，也是个提高。”这些话是他坐在我们家的一个过道里说的，至今记忆犹新。这对我鼓舞很大，也给我指明了一条自学之路。于是，我从小学五年级起，直至1973年底我应征入伍为止，就开始一篇不落地读“两报一刊”的文章及《解放军文艺》。读初中时，我有幸遇到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老师，他在上政治课时，较为系统地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基本的哲学原理，对我启发很大。高中时，我四处寻找可读之书，可惜农村偏僻，能借到的书十分有限。但我还是设法找到并反复阅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杨国荣的《中国哲学史》、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较多的由上级发至大队的通俗哲学小册子。真正的转机是我到部队之后，我所服役的部队是陆军一军二师六团特务连，连队人才济济，其中有些是高干子弟，与之接触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可以借到很多好书。其中不乏哲学或与哲学有关的书籍，如梅林

的《马克思传》、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历史著作。在部队的几年，我利用一切业务时间学习，阅读了不少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等方面的著作，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升。1977年2月我复员回乡的时候，虽然成了地道的农民，但已经是一个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并随时准备参加高考为之一搏的新式农民。终于，命运的转机来临。1977年冬恢复高考。虽然我也参加了考试，且大家（包括考场老师）对我期望很高，但由于缺乏基本的复习资料，摸不清情况，结果失利。但我没有气馁，经过半年多有针对性的复习，在1978年的高考中，终于以全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我报的第一志愿当然是哲学。

自入武汉大学后，在四年本科和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如同一棵“久旱逢甘雨”的禾苗，就好比一位长久在荒凉沙漠中艰难跋涉终于看到清泉的行者，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除了吃饭和睡觉，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上。我阅读了大量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这为我后来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科的第四年，我是以全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被批准提前半年毕业的。

在大学期间，有人说我是“学习机器”，我知道这话具有半贬半褒的意思。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骨子里面有“反叛”性格的人。即便在大学本科时，我就喜欢发问，是下课后围着老师提问最多的学生之一。1982—1985年读研究生期间，我对传统教科书体系开始产生怀疑，并对当时学界所开展的哲学改革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研究生毕



业之后，我在湖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执教了18年之久，与学界有些脱节。1996年重入武汉大学于陶德麟先生门下攻读哲学原理博士，特别是2002年底调入母校之后，由于与学界的频繁互动，我的思想又发生了一个新的跃升。

这些年来，我所着重思考的是哲学原理和马列哲学经典的反思和重释、中华和合辩证思维的探析以及关于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和时代逻辑的研究，并力图以和合思想为切入点，融会和贯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条件下，我深知自己学术水准之不足，但我所执着坚守的原则是文从己出、意从心生，不人云亦云，不跟风从众；我所终生追求的是以“非常规”的思维去审视一切，揭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层哲理，把握时代精神，彰显时代逻辑，用思想去观照一个思想的世界。我不敢奢望“立言”于千古，但求无愧于我心。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的教学和研究一直处于简单灌输和诠释的状态，论辩变成了说教，探讨变成了考证，智慧变成了知识，学生们所面对的哲学智慧已经堕落为只需机械记忆和背诵的公式了。例如，所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的”；所谓“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对立面的同一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等等。这些原理如果加以正确的阐释，本来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一旦将其当作无需论辩和不可质

疑的绝对真理，它们就立刻转化到自身的对立面。

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传统的惯性却根深蒂固，特别是潜藏在人们头脑里的基本思维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种现象在一般的“讲坛哲学”中，仍然普遍存在。

正是在这种教学模式的作用之下，即便是文科生乃至哲学专业的学生，其哲学思维十分不足，哲学智慧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和论辩态度竟然处于缺如状态。照此下去，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且富于哲学思辨的民族将离真正智慧的大道渐行渐远。

有鉴于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回归到哲学智慧的本原上去，重新用一种对话和论辩的方式去从事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这种想法首先在我主讲的课堂中进行实验，并积极利用“哲学沙龙”“经典句读”“师生对”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打开思维，重启智慧之门。这种做法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并且已经产生良好的效果。

“师生对丛书”就是这种新的对话和论辩式哲学研讨的一个成果。它以师生问答的形式出现，其内容涉及智慧的本质、思维方法、哲学理念、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哲学、时代精神、生活批判等诸多方面和广泛领域。这种对话对学生和老师都是一个重新学习和研讨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自始至终是开放的、自由的、愉悦而又痛苦的，它所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教条，而仅仅是一个论辩的场所、一个批判的舞台。它就好比一场盛宴，每个热爱智慧



的人都可以参与，都能在这场延绵不散的盛宴中分享智慧的快乐，获取智慧的营养。

这里要特别隆重推出的是漫画家杨旭先生。他现为武汉大学遥感实验室负责人，业余从事漫画创作。作品在中国、韩国等国出版发表。其中“人生启示录”系列漫画读物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并一度位列其畅销书排行榜前十；《香港经济日报》开辟“杨旭漫画”专栏连载其漫画作品长达数载。他以业余兴致作专业追求，以自得其乐求人生境界，练就了扎实的哲理漫画功底。根据他的策划，每则“对话”都配上了相应的哲理漫画。这些漫画，亦庄亦谐，一阴一阳，蕴涵深刻，寓意隽永，可谓妙笔生花。有了杨旭先生的妙笔，我的这些“师生对”也就增辉添彩了。在此，诚挚感谢杨旭先生的加盟。

左亚文

于珞珈山麓

2016年9月3日

序 言

《易传·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段话，实际上阐明了哲学之智的本质，这就是揭示隐含在“百姓日用而不知”后面的阴阳之道。

“哲学”这个词是外来语，它源于古希腊文，后拉丁化为“philosophia”，其意为“爱智慧”，哲学就是爱智之学。19世纪日本学者西周采用古汉文将其译为“哲学”。《尔雅》释：“哲者，智也。”用“哲学”译“philosophia”，其意颇合，故为中国学者所挪用，并得到公认，遂成此名。

然而，中国自文明发源以来就有哲学。“哲学”这个词在中国称为“道学”“理学”“玄学”“形而上学”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即无形无象也。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无象的东西，就是“道”。研究无形无象之“道”的学问就是“道学”“形而上学”。朱熹将“道”称为“理”，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

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故“道学”又称为“理学”。除此之外，老子还将其称为“玄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在这里，老子把作为万物大本大源的“道”叫作“玄”，故“玄学”由此而来。可见，中国不仅有哲学之名，而且有哲学之实，只是称谓有所不同罢了。

如果说中西方哲学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智慧特征就是其与生活的紧密融合。中国哲学也有其形而上的本体之学，如《易经》《老子》中的“道本体论”。但是，一般来说，中国哲学的致思重点在于百姓的日用伦常，因而更加注重其实践的价值和践履的功夫。这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儒家本身起源于教化之职。尽管关于儒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葬士说”“教官说”“文士说”“宗教说”等，但皆与教化有关。儒家形成之后，他们就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及其仁义之说以教人，上助人君，下化黎民，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扮演着“精神教父”的作用。而且，儒者倡导“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出入于朝野之间，与社会生活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儒家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其学说重实用、崇理性的价值取向，这反映在哲学世界观上就是极力将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贯通起来，通过道德践履将前者落实在后者之中。故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很少向学生讲授“性与天道”（《论语·公冶



长》)。这并不是说孔子不懂或不研究，而是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更加需要仁义之说和治国之道。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个人的德性修养和政治活动与性命天道相结合，将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本体境界。

儒家的生活哲学也是十分独特和智慧的。从表面上看，像孔子的《论语》似乎都是一些伦理说教和生活箴言，但精研其文，你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例如，关于“仁”的原则与具体道德条目的关系，孔子就从哲学本体的高度阐明了道德进化过程中的“变”与“常”的关系。在谈到二者的关系时，孔子明确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显然，“恭、宽、信、敏、惠”乃具体的道德条目，“仁”即贯穿于具体道德条目中的基本原则。孔子的意思是像“恭、宽、信、敏、惠”这样的道德条目是隶服于“仁”的、服务于“仁”的，是“仁”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道德条目不仅无限众多，而且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也许昨天符合道德的，到了今天就变得不符合道德了；反之亦然。但是，不管道德怎样变化，贯穿其中的作为整个道德赖以存在和发展源泉和基础的“仁”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仁”的原则之所不会改变，乃是因为它建立在“善”的人性基础之上。“仁者，人也。”（《中庸·第二十》）我的理解，这里的“人”，就是指“人性”。“仁”的原则作为道德之“常”，就立足于仁善的人性根基之上。这就揭明了道德的本体根源，即其发之于人的仁善之性，并引导人们去培育和弘扬这种美好的人性，以提升人的生命本质。

儒家对于人们道德生活的这种阐释源于百姓的日用伦常而又超越其上，揭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背后的本体秘密。当人们通过这种学说认识到这种基于人性的本体秘密之后，就会更自觉地涵养和践行道德精神，扩充和提升仁心善性；也会更理性地看待和处理道德进化过程中的“变”与“常”的关系，以便在社会变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阴阳之道、中道思维、天人之际、理一分殊、义利之辨、心物关系、知行关系、性善性恶、人心道心等问题上，儒家都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经验生活出发，探析其中隐含的本质联系和一般规律，然后又复归于百姓的日用生活，为其提供理性的引领和智慧的指导。

可以说，儒家哲学所彰显的就是这种源于百姓日用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最终又回归生活的智慧特色。但中国哲学也不缺乏纯粹的形上之智，特别是先秦之后，儒、释、道三家在互援互释中逐步走向“三教合一”，因而其形上的本体之道更加深化和完善。然而，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并未改变，其实质和核心仍然是对“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智慧超越。

相比之下，西方哲学在一开始就与日常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是一些纯粹的学者，其所思考的主要是万物的本原和认知方法等十分抽象的问题。他们强调哲学的相对独立性、自由性和非实用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他还指出：“我们追求这种知识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好处。我们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伺候别人而活着；哲学也是一样，它是唯

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① 特别是西方哲学在经历了近现代科学的洗礼之后，又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

然而，即便是西方哲学，归根结底，其研究仍然不能脱离日常的经验事实。例如，关于本原问题、认识论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问题等，都是对现实世界和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本质的一种抽象。当泰勒士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时候，虽然这里的“水”被赋予了普遍本体的意义，因而被黑格尔称之为“思辨的水”，但是，它毕竟是以“感性的水”为“基质”的。离开了“感性的水”，“思辨的水”就无从产生。只是在感性经验上，中国哲学更注重那些已纳入百姓日用伦常中的“经验生活”，而西方哲学则更关心那些与百姓日用伦常没有直接关系的“经验事物”。前者散发浓郁的生活气息，倾心的是“德性之知”；后者具有鲜明的实证色彩，着力的是“科学之知”。在通向智慧的大道上，东西方选择了不同的致思路向，因而体现出不同的智慧特色。

但是，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任何哲学，包括东西方哲学在内，其研究都要超越日常的经验而揭示其“百姓日用而不知”后面的本体秘密。哲学之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源于经验又高于经验，如果它与经验无异，哲学就成为多余的了。

但是，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一般原理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页。

哲学教科书却至今仍停留在经验事实上而不自知。众所周知，在大学的讲坛上，我们还在向学生灌输所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样一些感性的常识；在一些研究论著中，我们还在抽象地讨论“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要生产的，生产是要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是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这并不是说，哲学要脱离这些简单的经验常识，但不能止于常识，而是要超越常识，揭示与常识、常规、常理所不同甚至对立的东西，这才是哲学之为智慧的使命，将哲学等同于常识，就等于取消了哲学。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一些经验常识的堆积。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感性经验特别是感性活动的基础作用，但绝不是要停留于这个基础之上，而是要超越其上揭示与其相矛盾的内在的本质规律，特别是要揭示其与主体人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离开人去研究那种纯客观的自然界就堕入绝对主义的怀抱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些思想都是很明确的。但是，经过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大家的诠释特别是前苏联官方的改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肢解为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教条和教义。因此，只有创新和超越这种传统版本，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复归。

本书所选取的四十三则师生对话，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古代名家的辩题、儒家的中道思想以及一些人们关心的哲学问题。这些内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秘“百姓日用而不知”背后的“不知”究竟是什么？在经验常识中提炼“反论”，在日用伦常中探寻内隐，立足经验而又超于经验，源于

生活又高于生活，通过经验生活，把大家带入一个更本质、更现实的思辨世界，从而更深刻、更合理地理解经验生活，这就是本书的旨意之所在。

我国知名漫画家杨旭先生为本书每则对话都配上了风趣幽默且哲理深刻的作品。这些作品既可独立成篇，又与本书文字内容相映成辉。这也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哲学著述的一大特点。